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六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21 冊

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研究

李 興 源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研究／李興源 著 — 初版 — 台北縣

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4+33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編：第21冊）

ISBN：978-986-254-072-5（精裝）

1. 明代哲學 2. 知識分子

126

98015324

ISBN - 978-986-2540-72-5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 編 第二一冊

ISBN：978-986-254-072-5

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研究

作 者 李興源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年9月

定 價 六編 30冊（精裝）新台幣 50,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研究

李興源 著

作者簡介

李興源

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學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

經歷：

高雄市高雄中學教師、組長

高雄市小港高中主任、校長

現職：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助理教授

著作：

劉戡山教育思想之研究（碩士論文）

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研究（博士論文）

劉戡山「誠意之學探析」（《中國國學》第十七期）

宋明新儒學哲理化述要（高雄師大國文系《問學》第四期）

提 要

本論文探討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兩個變項，一方面闡述各自的衍化，另方面剖析其交互作用，最後闡明其對整個時代風氣之影響。

明代自神宗萬曆起，衰兆漸趨明顯，皇帝荒廢政務、貪婪無度，仕宦集團朋必黨爭、徇私內耗，政府機制毀壞，社會價值崩解，至思宗崇禎十七年（西元 1644），明代淪亡。其間質變過程，本論文將引用史典，考索別見，宏觀時局，微觀士人，詳加論述。

史家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蓋晚明政治，自萬曆十四年，皇三子出生後，「立國本」之爭議幾乎貫串整個萬曆朝；社會則是一個「民貧世富」的時代；文化上是儒、釋、道及西方天主教之間互斥互納的過程。學術思潮由理學到心學的震盪，加入了釋道的哲理及自我深化的探究。而陽明心學強調「心」的無所不包，「良知」的無所不能，王門後學據此發揚，尤其王畿一系及王良的泰州學派，擴張了陽明心學影響的範圍，卻也導致末流之恣肆空疏。

晚明士人生存在一個詭譎多變、失節失序的政治環境中，必須面對並選擇自己所安的生存樣貌。對於為政任事、行止出處、人生受用都需要重新斟酌。要折衝廟堂或退隱山林；要堅持士人之道或屈服皇帝之勢；要爭是非或爭立場；要繼續廟堂文學，或走向性靈的範疇等等，對於當時士人是一項嚴峻的考驗。

晚明是一個由輝煌走向頹敗的時代，也由頹敗醞釀另一開始的契機，如狄更斯《雙城記》裏所謂：「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晚明如此，現代也如此。如果這種時代的到來是歷史的偶然，那麼，就思考如何避免發生；如果是歷史的必然，就思考如何有效救治。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研究主題義界	5
一、晚明斷限	5
二、心學商榷	7
三、士風釋義	9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11
一、文獻探討	11
二、研究方法及限制	16
第二章 晚明心學思潮轉型之時代背景	19
第一節 政治氛圍	19
一、張居正之務實改革	19
二、君臣交爭，綱紀陵夷	24
(一) 國本之爭	24
(二) 政爭與黨爭	27
(三) 三案聚訟	32
三、政局與心學發展	34
第二節 社會風氣	36
一、城鎮興起，商業發達	37
(一) 逐利爲尙，附庸風雅	37
(二) 逾越倫常，好遊享樂	39
二、規範鬆弛，僭越爲常	41
(一) 朝綱違紀，禮制崩壞	42
(二) 上行下效，傳統解構	44
三、礦稅災禍，民變蠱起	47
第三節 文化取向	53
一、三教合一	53
二、中西文化交流	60
三、心學與天學「具存深意」的文化心態	66
第三章 晚明心學思潮之衍化	71
第一節 陽明之心學體系	71
一、朱學到王學之轉變	72
二、陽明心學主要內涵	77
三、四句教的影響	83
第二節 王門後學之思想革新	85
一、異端的價值意義	86
(一) 以「狂」爲質	86

(二) 以「我」立說	89
二、日用之學	93
(一) 平民意識	93
(二) 破除名教	95
(三) 以人爲本	97
三、自得之說	99
(一) 順性	100
(二) 適世	103
四、貴真之情	105
(一) 以誠入情	105
(二) 以情爲教	112
第三節 遺音與前奏——王學末流之歷史意義	115
一、晚明心學的禪宗化	115
二、開啓明末清初的經世之學	121
第四章 晚明士風之曲變	127
第一節 人生價值的轉化	127
一、「退無營業，進靡階梯」——人生價值的重新選擇	128
(一) 從兼善天下到追求自我實現	129
(二) 從存天理到重人欲	130
(三) 從名節自礪到明哲保身	131
二、「廷論紛呶，物議橫生」——廟堂的折衝	133
(一)「外畏清議，內固恩寵」——大臣的依阿自守	133
(二) 振風裁而恥緘默——爭則名高的心理	135
(三) 名麗閹黨，依媚取容——士人的人格滅裂	137
(四)「榮出於科目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士人的義理承擔	141
三、「朝列清班，暮幽犴獄」的憂懼與棲息之調整	144
(一)「不如安樂窩中去，靜聽鶉聲叫洛陽」的隱士風采	144
(二)「挾詩卷，攜竿牖，遨遊縉紳」的山人舉止	146

(三)「骨剛情膩」的名士遺風	149
(四)「不受名教羈絡」的狂禪行徑	152
第二節 生活形貌的展現	155
一、聞風景附——熱衷講學之態	156
(一)講學盛況	156
(二)講學要旨	159
二、玩物采真——古雅品味之追求	162
(一)雅緻爲尚	163
(二)疵癖爲美	166
三、孤雲出岫——骨剛情膩之超然	169
(一)親近佛道	169
(二)寄情山水	173
四、癡有真色——聲色犬馬之逐	176
(一)傲睨優伊的頹廢恣肆	176
(二)滑稽排調的譏諷解嘲	179
第三節 小品文的異端色彩	183
一、創作心態的轉折——「脫棄陳骸，自標靈采」	186
(一)理論傳承	187
(二)創作態度與地位	194
二、多元化的審美追求——「各極其變，各窮其趣」	199
(一)自然之趣	200
(二)諧奇之趣	202
(三)禪逸之趣	206
第五章 晚明心學與士風變異之反思	211
第一節 正統與異端的辯證——美惡不掩，各從其實	211
一、學術異端的衍化	211
二、文學異端之變革	225
(一)寧爲狂狷，反對邯鄲學步	225
(二)文學「時」與「變」的演進觀念	231
第二節 勢與道的對峙——思想徬徨，士風轉折	236
一、世宗：道之起落及轉折	239
(一)大禮議事，道勢對峙	239
(二)枉道附勢，士風趨軟	249

二、神宗：以道事君之潰敗	251
(一) 奪情案：道統之於政統的窘境	252
(二) 違道干譽，循默避事	254
三、熹宗：道的徹底摧毀	256
(一) 勢尊道喪	257
(二) 道一蹶不振	258
四、思宗：勢、道同殉社稷	259
(一) 大勢已傾，積習難挽	260
(二) 以道抗勢，以身殉道	261
第三節 立場與是非的混淆——黨同伐異，因於好惡	264
一、忿戾之氣，黨比之習	265
(一) 官職制度之矛盾	266
(二) 論政過程之黨爭	272
二、矜名惡異，士風崩頹	282
(一) 提拔私人，人才凋零	283
(二) 君子小人，厚薄無據	285
(三) 宦情太濃，官場依違	288
第六章 晚明心學之影響與時代意義	293
第一節 心學與佛禪融合的意義——尊同敬異，回歸本質	294
一、心性學說之轉折綜論	296
二、狂禪的人文意義	299
第二節 厚積薄發與別開生面——不拘格套，開展實學	303
一、文學上——小品文之啓蒙與發微	303
二、學術上——實學之發揚與變通	306
第三節 時代省思——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311
一、國政荒廢與狂狷士風不再	312
二、末世人文情懷	319
主要參考書目	325
一、古籍	325
二、文史哲專著	328
三、學位論文	330
四、期刊論文	332

第一章 緒 論

當十四世紀中葉（西元 1368 年），大明帝國誕生，此時正是歐洲文藝復興萌芽，而當十六世紀，歐洲已擺脫中世紀向近代邁進的時候，大明帝國呈現的是社會極端富裕奢侈，但官僚體系則極端昏庸腐敗，終於十七世紀中葉（西元 1644 年）結束王朝。而東西雙方出現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不再盲目接受所謂的「美德」，開始對舊事物發生疑問，並尋求答案。這種新的精神，歐洲稱為「人文主義」，晚明被視為「異端」，人文主義推動著文藝復興往光明的方向前進；異端則在衝撞體制的過程，消失在明清之際，大明帝國換成大清帝國後，代表社會希望的「士人」，又回到訓詁考據的老路。

明朝這段歷史，擁有最璀璨的文化、最富裕的商業貿易、最強大的中央集權跟官僚體制，〔註 1〕但經過兩百七十六年，終告殞落。本來是一個大有為的時代，何以致此？尤其，到了晚明，自由經濟萌發，平民意識覺醒和人文主義上揚。於是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諸多領域內，產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為什麼不是提升，而是沉淪，就必須考察這些變化，如何影響當時的士風與文風，特別是由士人集團包括皇帝在內的統治階層，他們的心術和作為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自孔子開始，經世理念並未把義利對立，其推行「仁政」，首倡「足食、足兵」。孟子與梁惠王論義利時，告訴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註 2〕王不必曰利，並不等於民不必曰利，因為王已擁有天下，應胸懷仁義，

〔註 1〕有關明代都會工商業之興盛與中央集權之改革，可參夏咸淳先生《晚明士風與文學》一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9～16。

〔註 2〕《孟子·梁惠王上》。

如此，百姓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他也具體的談百姓之基本利益：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註3〕

孟子認為樹桑、育畜、耕田等，如能依時而進，百姓就能免於饑荒，老者更能「衣帛食肉」，人民生活安樂，君王權位自可安定。自漢朝起，董仲舒提倡「正誼不謀利」，上位者提倡，下必有甚焉者，此後，只談道與義，羞言功與利，形成以義為尚，以利為俗之觀念，談利遂成避諱。至宋，雖有永嘉學派葉適，重視事功之學，並與朱熹（晦庵）理學、陸九淵（象山）心學成鼎足之勢，但功利之說終未盛行，朱熹理學遂成官學。

朱熹理學被定為明代科考之範本，「述朱」蔚為風氣，但其推衍既久，逐漸變得繁複支離，陽明心學的直截簡易，應運而起，中明以後，「新建」獨領風騷。從此，程朱理學仍為官方意識，陽明心學則在後學的講學論述中廣為傳播。陽明學說之所以能發揚甚至變異，端賴兩大弟子王畿（龍溪）、王艮（心齋）的勤於講學、勇於創新之影響。龍溪發揮「利根」思想，以「無善無惡」為論述重點，開啓與禪學合流之契機，也留給程朱後學攻擊之口實；心齋則提出「百姓日用之學」，成為學術思想史上一個重要命題，把學術引向平民化、生活化。而其另一重要影響，則在其心雄志高的氣概，開創泰州學派的英雄路線。但是，晚明心學逐漸趨於疏闊恣肆、空虛玄妙，而明朝命脈亦於此時趨於風燭之危，因而，心學思潮被認為是國運衰亡的主因，這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本論文試著加以釐清。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學術遞嬗更易，猶如鐘擺兩端，其內部本已蘊含反動力量。因此，從南宋至中明，晦庵理學流行而象山心學隱晦；中明以後，陽明心學流行而晦庵理學隱晦；至明清之際，晦庵理學復甦，研究的方向與重點，逐漸由見性明理（內聖）轉到民生日用（外王）。亦即，由學術的心性之學擴及攸關國計民生的實學。但是，明清之際學者包括清初一些大儒，每每以空疏淺薄來論定

〔註3〕《孟子·梁惠王上》。

晚明學者的學術成就。如顧炎武（亭林）批評說：「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註4〕其實，晚明文士除文章出眾外，亦懷經世之志，如湯顯祖，雖後人「但賞其詞曲而已」，〔註5〕但其泛覽百家，精通五經史學外，並精研「天官、地理、醫藥」〔註6〕等實務。再如馮夢龍（猶龍），在壽寧縣任內，曾修纂《壽寧縣志》，〔註7〕綜練實事，也長於史學，王挺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註8〕著成《春秋衡庫》一書。又如張岱（陶庵），人或記其「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註9〕的輕狂形貌，但隨著明亡，榮景成空，鼎食頓成風露，遂苦心著述，完成《石匱書》、《夜航船》等卷帙浩繁的巨著，更見其孤詣之心志。

其次，從文學表現而言，《四庫全書總目》編者對晚明公安派與竟陵派訾議最多，在袁宏道（中郎）和鍾惺（伯敬）著作下，指為「輕佻放誕」、「矜其小慧」、「掉弄聰明」等等。甚而認為鍾惺詩文「纖佻詭僻，破壞風氣」，〔註10〕是明亡國之原因，〔註11〕如此論斷，似已流於羅織因果。就鍾惺論政部分觀之，他曾說：「使臣子於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於臣子收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註12〕又說「衣食屋居城垣，凡有國者皆事其事，不必為盜與虜也。不幸而欲當盜與虜，則溫飽安全之民猶可往，而無衣食屋居城垣之民不可往者，是為國者之所深念也。」〔註13〕他的「經世」作為明顯可見。如袁宏道，博覽經史百家，又融通心學、佛學、老莊之學。「上下千古，不作逐塊觀場之見。」〔註14〕他在擔任吳縣縣令時，政績卓著。亦即文藝與經世本可並行不悖，責文藝之華

〔註4〕《顧亭林詩文集·與友人論學書》。

〔註5〕《湯顯祖詩文集》附錄，錢謙益撰〈湯遂昌顯祖傳〉。

〔註6〕同前，鄒迪光撰〈臨川湯先生傳〉。

〔註7〕《志》中所載：「疆域」、「城隍」、「學宮」、「土田」、「戶口」、「賦稅」、「積貯」、「兵壯」、「獄訟」、「鹽法」、「物產」、「風俗」、「歲時」諸項，件件皆關切民事。

〔註8〕《挽馮猶龍》，見《馮夢龍詩文集》。

〔註9〕《聊齋文集·自為墓誌銘》。

〔註10〕清朝《軍機處奏准全毀書目》對鍾惺《隱秀軒集》的評論：「（鍾）惺詩文纖佻詭僻，破壞風氣，本無足取，詞句內亦有悖犯處，應請銷毀。」

〔註11〕朱彝尊先生，把明之覆亡歸咎於鍾惺：「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蝕星變，龍螭羈禍也，為詩有然。萬曆中竟陵……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

〔註12〕《隱秀軒集》卷二八，〈與袁滄菴論楚中鹽貴書〉。

〔註13〕同前卷二三，〈善為國者取於人事〉。

〔註14〕《珂雪齋集》卷十八。

麗爲處世之輕佻，猶責月亮不放出太陽的光芒，本不相屬，硬要牽連，亦本論文期以辨明者。

最後，處於正嘉時期的陽明，曾描述當時政治環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對士風則認爲：「士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註15〕至萬曆年間，昏君亂臣，腐蝕國政，漸露敗相，士人雖欲救治，卻流於黨爭不斷，耗損更鉅。至熹宗時，宦官壟斷君權，專以報復爲能事，國事遂淪於土崩瓦解。至崇禎不過等待敗亡的結果而已。

上述士人的思想、學說、著作，皆與晚明心學思潮有關，他們除擔負著知識傳播與文化思想承傳的使命外，其身處晚明時空的心靈感受、處世心態，亦無不折射於其生活品味與舉止行爲。因此，考察他們在朝廷腐壞、社會脫序、財政破敗下的尷尬境遇，所展現之舉措與理想，欲突破傳統儒教桎梏之代價，乃至於探求其精神人格，和身處其間所呈現的生活情態，以及力求解脫的途徑，對於今日處於歷史轉折處的台灣知識分子，當能提供一些安身立命的省思與啓示，此乃本論文研究旨趣之所在。

環顧當今，政治則貪腐不斷，黨爭不息；社會則功利掛帥，貧富懸殊；價值系統崩解，人民陷於徬徨。由士人集團所組成的官僚階層，其理想性、清廉度、公正性一再被質疑，相較於晚明時期，其傲慢與偏見之荼毒蔓延，實不遑多讓。因此，探討晚明這一段由興而衰的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期能作爲人文心靈反省的借鏡；特別是理學思潮發達的當時，士人面對生死、名利、出處等重大人生問題時，以比眾生更深的思考與心理反應，是否可以做爲當下政經、文化界人士的思索？

因此，本論文試著以晚明知識分子的思維——「知」做爲一個切入點，以晚明充滿興衰伏流之文化發展中，士人的出處、應對、進退之「行」做爲現今士人的借鏡。「知」強調心學思潮，「行」著眼於士風變異，也與陽明「知行合一」主張作一呼應，故以「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做爲研究主題！若能了解晚明士人處世的心態、人格的追求與文學創作的內涵，藉以在尚友古人之際，高大其心志，自振於流俗。尤其，士人對國家興衰，素存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在現實生活中，必須調適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經由文學作品發抒其隱微的心理。因此，擬透過典籍的閱讀思索，尋繹前賢之曲衷，所謂讀書的樂趣，不在聞名，而在於思考，此乃撰寫本論文之目的所在。

〔註15〕《王陽明全集》卷四，〈與黃宗賢〉。

第二節 研究主題義界

一、晚明斷限

有關晚明斷限之探討，學術界素有不同看法。首先，近人嵇文甫於《晚明思想史論》言：「這樣一個思想史上的轉形期，大體上斷自隆（慶）、萬（曆）以後，約略相當於西曆十六世紀的下半期以及十七世紀的上半期。」而夏咸淳於《晚明士風與文學》則說：「時在明代嘉靖中葉以迄崇禎末世一百年間，資本主義因素萌發生長起來了，商品經濟發展很快，城市和集鎮空前繁榮。時代為知識階層展現了一個新天地，安排了一個新環境新舞台。」〔註16〕兩位所認為的晚明，一在嘉靖中期、一在隆慶起始，相差約二十年，終點同樣止於崇禎末。

其次，左東嶺於《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一書中，就歷史分期而言，指出「晚明」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僅就其起點而言，便有多種說法，史學界也並未有定論。歸納其說，可分述如下：

其一，如從明代學術思想的發展變化而言，則以隆慶年間為晚明之起點，《明史·儒林傳》說：「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註17〕也就是說，在嘉、隆以前，陽明心學雖已出現並流行得相當廣泛，但從整體上說依然是程朱理學佔主導地位；而在此之後，王學則影響超過程朱。那麼，如何判定理學與心學在士人心中所佔地位，左東嶺認為：「判定理學與心學之間學術影響力發生轉化的唯一標誌。恐怕應該是官方對心學的認可時間。」據此，嘉靖一朝，儘管心學在江南士人中已廣為流行，但在嘉靖八年，世宗宣佈王學為偽學而加以禁止，〔註18〕到嘉靖二十六年王門弟子徐階之入內閣，此一時段可視為是王學之挫折與壓抑期。至隆慶初，陽明之恤典被迫

〔註16〕 見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9。

〔註17〕 《明史》卷二八三，〈儒林傳〉。

〔註18〕 《明世宗實錄》記曰：「吏部會廷臣議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相互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者藉其虛聲，遂敢於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夫功過不相掩，今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卷八嘉靖八年二月甲戌條）

補，王學也得到朝廷的承認，由此便進入其自由發展的時期，從而說明《明史》以嘉、隆爲界的本意大抵如此。

至於萬曆朝又如何劃分？撰述者各依其目的，而有不同劃分。如明史專家孟森在其《明清史講義》中，分萬曆爲三期：萬曆前十年爲冲幼期；張居正去世至四十五年爲醉夢期；四十六年以後清太祖起兵，是爲決裂期。^{〔註19〕}而黃仁宇將萬曆十五年，作爲神宗朝的分期標誌，甚至認爲本年乃是「歷史上第一部失敗的總記錄」，^{〔註20〕}亦即是明代興衰的轉折點。左東嶺撰寫《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從心學與士人關係入手，則以萬曆十年張居正之死作爲標誌，將王學之發展再分爲前後兩期。自隆慶元年至萬曆十年，王學雖被朝廷解禁而有相當的發展規模，但因有高拱、張居正之限制而未徹底放開。待張居正病逝後，王陽明遂得入祀孔廟，心學乃得以在朝野流行無礙，然隨著朝政之日益變化，士人對政治遂日生厭離之感，王學由此也發生轉向，成爲士人追求自我解脫與自我適意之學問，多數士人亦將其與釋、道合而言之，公然談禪論道而無復忌諱。當時雖有東林諸子對其空虛之弊加以指責，並有後來劉宗周（蕺山）諸人起而改造之，然已難以對士人造成重大影響，則王學與士人心態之論述亦結束於此。

新近，由樊樹志撰著的《晚明史》，^{〔註21〕}起自萬曆元年（1573），迄至崇禎十七年（1644），是學術界認爲較爲系統論述晚明歷史的專著。這七十一年間所發生的重大問題，舉凡首輔之爭、隆萬新政、神宗與張居正的恩怨、明末三大案、東林與復社、明廷的撫與剿及戰與和、晚明中國在世界全球化經濟中的地位等，都作了精當的論述。樊樹志先生提出許多深刻獨到的觀點，凸顯萬曆以後的明代與之前的明代判若兩朝，並認爲晚明是一個可供選擇、而結果又未能改變歷史宿命的特殊階段。

〔註19〕《明清史講義》：「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萬曆在位四十八年，歷時最久，又可分爲三期：前十年爲冲幼期。有張居正當國，足守嘉、隆之舊，而又或勝之。至居正卒後，帝親操大柄，泄憤於居正之專，其後專用軟熟之人爲相。而怠於臨政，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惟依閹人四出聚斂，礦使稅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曠其職，邊患日亟，初無以爲意者，是爲醉夢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入佔遼、瀋，明始感覺，而徵兵徵餉，騷動天下，民窮財盡，鋌而走險，內外交乘，明事不可爲矣，是爲決裂之期。」（頁246）。

〔註20〕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頁238。

〔註21〕《晚明史》（上下卷）樊樹志撰，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綜言之，史家論晚明史通常是從神宗萬曆朝算起，原因大致是晚明的末世亂象，是從萬曆一朝肇始積聚，《明史》中說的「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亦是此道理。〔註22〕本論文以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為探索主題，參酌諸先進，乃以萬曆初到崇禎末，作為晚明的主體時期。蓋萬曆朝確實是明朝國運的大轉折，其累積的惡兆，塑造了天啓朝的魏忠賢，使忠良幾乎滅絕，致「元氣盡漸，國脈垂絕。」；〔註23〕至崇禎朝，沉疴難救，思宗「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殫亂，子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註24〕故自萬曆至崇禎，是一個滅亡的因果歷程。至於文中述及萬曆之前，因其足以影響後來心學與士風之轉變故也。

二、心學商榷

所謂「心學」，陽明認為：

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註25〕

於此，可知晚明「心學」乃「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者一體發明之總稱。至於「心學」精神之溯源，陽明亦曾提及：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註26〕

〔註22〕隆慶六年（1572），穆宗去世，神宗繼位，改號萬曆（1573），神宗在位長達四十八年。之後是泰昌帝明光宗（光宗在位只有一個月）和天啓帝明熹宗，這兩朝總共只有七年時期。從萬曆到天啓的半個世紀的時間，無論是在明代歷史上還是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都是一個轉折點。

〔註23〕《明史》卷三〇九，〈流賊·前言〉。

〔註24〕同前註。

〔註25〕《明儒學案》卷一〇，〈姚江學案〉。

〔註26〕《王陽明全書》卷七，〈重修山陰縣學記〉。

陽明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強調道心與人心之合一，與人心爲善的可能性。顯然，王氏心學是把道統的「允執厥中」轉化爲關於「人心惟危」和「道心惟微」的推定，這就在儒學道統的本體論和邏輯推定的形式上易成成本末倒置，即成爲對「人心」和「道心」之「心」的研究，從而疏離了「允執厥中」，促使心學在晚明不斷衍化、轉化，也提供士風變異的充分條件。

此外，心學泰州學派代表人物——李贄，亦曾對心學發展大勢，作總括式的敘述：

……慈湖（楊簡）雖得象山簡易直截之旨，意尚未滿，復參究禪林諸書，蓋真知生死事大，不欲以一知半解自足已也。至陽明而後，其學大明，然非龍溪（王畿）先生緝熙繼續，亦未見得陽明先生之妙處……。心齋（王艮）先生之後，雖得波石，然實賴趙老（貞吉）篤信佛乘，超然不以見聞自累。近老（羅近溪）多病怕死，終身與道人和尚輩爲侶，日精日進，日禪日定，能爲出世英雄，自作佛作祖而去，而心齋先生亦藉以有光焉故耳。故余嘗謂趙老、羅老是爲好兒孫以封贈榮顯其父祖者也，王龍溪先生之於陽明是得好兒子以繼承其先者也。……今所未知者，陽明先生之徒如薛中離之外更有何人，龍溪之後當何人以續龍溪先生耳。〔註27〕

這是心學的發展大勢，楊慈湖藉助禪佛而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理論；陽明得龍溪發揚，使妙處顯現；心齋得趙貞吉、羅近溪而發揚光大；李贄觀察到，龍溪發揚了陽明，但「龍溪先生之後，當何人以續龍溪先生耳？」可見其對龍溪的嚮往，儼然以繼承者自許。

王畿（龍溪）對李贄最大的影響，在「無善無惡」之理論的闡述；而泰州學派對李贄的最大影響，在其狂傲勁直的人格氣質，所以李贄說：

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爲最英靈。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欲與之辯質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後自知其不如，乃從而卒業焉。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何如者！心齋之後爲徐波石，爲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

〔註27〕《續焚書》卷一，《與焦漪園太史》。